

眷村文化与台湾省籍矛盾

张文生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台湾的省籍矛盾根植于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因素中。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量兴建的眷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省籍的隔阂。眷村第一代外省人怀着对中国的强烈认同, 他们是坚决反“台独”的一代, “拥蒋反共”也是他们浓重的意识形态。然而外省第一代深重的故土眷恋的游子性格也造成了与台湾本土社会的疏离, 进而使得眷村的外省第二代成为台湾社会漫游者, 受到身份认同的困扰。眷村文化作为台湾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次文化形态, 记录了台湾外省人的过去, 眷村文化所留下的省籍矛盾还影响着台湾的现在和未来。

关键词: 眷村文化; 台湾; 省籍矛盾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69(2007)04-0058-04

台湾的省籍矛盾的形成, 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近年来台湾蓝绿阵营的政治恶斗、少数政治人物的有意操弄是加剧省籍矛盾的主要现实原因, 然而少数政治人物之所以有机可乘, 也因为省籍矛盾根植于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层心理因素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台湾眷村文化的特殊性, 揭示台湾省籍矛盾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眷村: 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省籍的隔阂

台湾眷村是指 1949 年起至 1960 年代, 在大陆战败的国民党当局, 为了安置被迫从中国大陆各省迁徙到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 所兴建的房舍形成的聚居区。由于这些被称为外省籍的去台人员相聚而居, 形成并保持了与台湾本土社会有一定差异的思想文化, 被认为是台湾次文化。台湾眷村文化是台湾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不仅是 1949 年以后 60 万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真实生活写照, 也是外省人在台湾 50 多年生活历史的集中反映。

台湾眷村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 同时也是一种“被迫型政治性人口移转”。台湾光复以后, 大陆

人民开始大量迁移台湾。特别是 1949 年前后, 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随着国民党政权抵达台湾并相聚而居。据传当时为了方便薪资米粮等生活物资的分配, 开始兴建集合式的居民区——“眷村”, 由军、公、教、“中央民意代表”按职等不同抽签取得依不同坪数、不同等级划分的无产权宿舍。

朝鲜战争前后, 浙江省大陈岛全岛居民被国民党政府迁徙到台湾, 也有部份朝鲜战争的战俘被遣送台湾。这二批移民在当时被界定为“有情有义”的群体, 随即被安置在“义胞新村”居住。因此, 集合军、公、教、义、“中央民代”等五大阶层的眷属宿舍开始散布于台湾各地, 台湾本地百姓则围绕着眷村设立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场, 用“以物易物”方式开启与眷村的经济活动。

台湾的眷村大多建在海陆空军事基地的周边, 处于封闭状态。眷村内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 所以眷村居民没有大事, 一般都不出村子, 在眷村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生活圈子。由于眷村的生活方式、建筑景观及人际关系与具有闽南与客家特色的台湾本土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距离。眷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在这样

收稿日期: 2007-09-18

作者简介: 张文生(1969-), 男, 福建上杭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985 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主要从事台湾政治制度、政党政治、选举以及两岸关系研究。

封闭的环境中，在眷村居住的外省人发展出一套仿佛置身于台湾社会之外的性格与情结，而台湾本省籍民众也将眷村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外来的社会。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杨渡认为：“为了国防与安置，国民政府在台湾各地设立营区与眷村，这就形成总体的文化影响与冲突”^[1]。

二、眷村：至死不渝的“中国认同”

台湾眷村可以说是军队生活的一部分，让外省移民有一个家的所在。眷村文化中充满着国共内战所带来的圣战使命的氛围，军队的精神又集体化和制度化了眷村内子弟的思维，使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不同于竹篱笆外的世界。眷村居民常把村外人统称为“老百姓”，与自己的军籍背景相区别。

老一辈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反共复国回家乡”，土地、国家、民族这些伟大的光荣使命，仍然存在老一辈居住在眷村中的外省人的印象中。他们中有些人经历过国土沦陷、奋起反击的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芦沟桥事变”、上海四行仓库、南京大屠杀是他们的共同历史记忆。“外省人”这个概念，在“戡乱复国”时期，是一个充满了使命感、甚至是宿命感的词语。

第一代眷村外省人由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明确感受到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产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他们在台湾随着时间渐渐凋零，不少人在离开世间前还坚持着一辈子的使命感和回到家乡的梦想。怀着对中国的强烈认同，他们是坚决反“台独”的一代，当然，他们所认同的中国在政治内涵上大多是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眷村中外省人的“中国认同”不断受到“台独”势力的挑战。由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他们无法把票投给民进党候选人，他们支持过坚决反“台独”的新党的成立，他们也投票支持过对抗“台独”分裂势力的林洋港、郝柏村。然而，他们毕竟是台湾选民中的少数力量，无法对抗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的浪潮。

本土意识的高涨和“台独”浊浪的汹涌，使眷村中外省人的“中国认同”在台湾社会难以立足，他们被贴上“外来政权”附庸的标签，他们甚至被骂“中国猪”。他们甚至还遭到政治上有意和无意的攻击，民进党认为：“对特定身份团体的差别待遇，破坏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团结，造成‘社会公义不正

常’”，因此，要以推动“转型正义”之名，“消除威权统治遗留的政治符号与资源分配不公”^[2]。眷村外省人的“家”到底是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落脚的村子，或者是台湾现代的城乡？他们不断地在对国与家的概念进行定义，试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寻找一个生存的合理性。

三、眷村：“拥蒋反共”的意识形态

眷村中外省第一代的命运与蒋氏政权紧密相连。他们跟着蒋氏父子流落台湾，蒋氏父子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支配着他们的一生，安排着他们的生活。蒋氏父子的“反共复国”事业就是他们生存的使命和意义，“拥蒋反共”是眷村外省第一代浓重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他们是国民党和泛蓝阵营的铁票。国民党在眷村成立过特种党部——即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部是国民党在选举中动员能力最强的组织，黄复兴党部的提名人选一般不会落选，黄复兴党部的配票能力最为有效。2006年，谢长廷在竞选台北市长的过程中感叹，无论他如何努力，他在眷村中的得票最多都只有一成。

台湾本土力量的兴起，使得外省第一代“拥蒋”的意识形态成为他们的原罪。民进党的上台使蒋氏父子彻底蜕去了原来的光环。在泛绿阵营看来，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是白色恐怖的制造者，是专制政权的独裁者，是外来政权。“去蒋化”是民进党执政后期所谓“转型正义”的内容之一，包括把“桃园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国际机场”、“中正纪念堂”更名为“民主纪念堂”、在台湾各地拆除蒋介石的雕像、废除蒋介石的纪念日。

眷村中的外省第一代对蒋介石的记忆根深蒂固，难怪谢长廷在眷村拜票还有人支持他“竞选蒋总统”。民进党当局的“去蒋化”显然并不能消除眷村中的外省第一代顽固的“拥蒋反共”意识形态，相反却加剧了眷村中的外省人对于民进党的反感与仇恨。民进党当局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颠覆了他们生命的原有意义。

在眷村第一代外省人的心中，领袖与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几乎相等。所谓“反共复国”事实上就是一场跟随蒋氏父子奋斗的终身事业。当初仓皇赴台的外省人，依靠蒋氏父子有限的“照料”，在那个台湾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尚可自足。加上当时氛围是以“反共回乡”为首要希望，苦一点也过得去。只是随后进入的台湾经济成长黄金期，让不少本省籍农家靠

土地增值致富,本土工商业资产阶级迅速兴起,然而眷村中的外省人不仅回乡无望,而且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急剧低落,使得这群当初“拥蒋反共”的外省第一代成为台湾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因贫穷转为对台湾当局的怨怼,政治上受压迫的状况也成为他们不满和挑衅台湾当局的重要原因。

四、眷村:故土眷恋的游子性格与台湾本土的疏离

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曾说,他的父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这一代外省人都因为战乱离开家乡,毫无祖产,随政府来台,完全靠劳资来建立生活。这个描述可以说是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的写照,发展在心理层面,培养了外省第一代的独立性格,却也造成第二代的人际关系疏离。杨德昌就曾剖析过他自己的状况:“到现在还没办法很熟练的和长辈应对,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眷村第二代就在这样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的环境下生长,并由邻居身上发展对亲人的认知。”

居住在眷村的第一代外省人在时代及岁月的转变中虽然心里还有一点“反共复国”回家乡的盼望,但为了生活,他们陆续开起面店、卖着烧饼油条,扮演起放下枪杆后的台湾百姓角色。面对着竹篱笆外的都市化及经济发展,这一代眷村人只能以虚构的家乡来填补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台湾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中,贴切地描写出这一代人的特色:“他们总习惯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作故事以飨儿女。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以及经过十数年反复说明的膨胀,每个父家母家都曾经是大地主或大财主,都曾经拥有十来个老妈子一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逃难时沿路不得不丢弃的黄金条块与日俱增,加起来远超过俞鸿均为国民党搬来台湾的……曾经有过如此的经历、眼界,怎么甘愿,怎么可以就落脚在这小岛上终老?”^[3]这样的描写,除了道出这群经历战乱的外省人不甘于落脚在这个小岛上之外,也道出了他们面对现实环境的无法抵抗,将宿命的安排与生活无奈的情绪都推给一个不存在的虚无。

眷村外省人的集合是以“反共复国回家乡”为目的,对于所生存的台湾却着墨不深,他们可以侃侃而谈大陆家乡的历史和地理,却不知道淡水河的长度、曾文水库的集水量,表现在生活中的态度就成为不轻易置产的“过客”心态。

五、眷村第二代:台湾社会的漫游者

眷村的外省第二代之所以成为台湾社会漫游

者,原因在于他们受到第一代眷村人对于家国认同的坚持和回到故乡原点的祈盼影响,他们更受到身份认同的困扰。眷村中的外省第二代是他们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在眷村中完成的,他们从小被刻画了共同的未来,他们一生都必须记得,有一个“保家卫国”的使命。一方面,眷村外省第二代学到的,是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 and 文明,他们中的有些人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严格熏陶,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对大陆没有任何感性的印象,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来自于蒋氏政权和西方社会反共的教育。眷村中的外省第二代与第一代的经验不同,体验了不同的人生,一方面,他们需要从眷村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眷村的外省属性阻碍了他们融入台湾社会、成为“新台湾人”的过程。

台湾作家朱天心曾经在作品《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解释外省第二代始终无法深耕台湾的原因:“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3]。她也描述了眷村中特殊而有限的“台湾人经验”。“大概非眷村,或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本省外省人都无法理解,很多眷村小孩,在他们二十岁出外读大学或当兵之前,是没有‘台湾人’经验的……至于为数众多的大陆籍妈妈们,十数年间的唯一台湾人经验就是菜市场里那几名卖菜的‘老百姓’,因此她们印象中的台湾人大致可分为两种:会做生意的,和不会做生意的”^[3]。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眷村外省第二代,虽然从小仍接收着保家卫国、回归家乡的观念,然而却在步出竹篱笆后看见了不同于想象中的神州大陆和外部世界。身为外省第二代所背负的家国认同问题及身份问题,让他们生活在与环境看似融合却又时时对立的处境之中。面对外部世界,眷村外省第二代深感如果再留在村里,那只代表了他“走不出去”。眷村外省第二代生活在充满意识形态,步调缓慢的村子中,并且了解村外的世界是无法以父母亲的步伐基调去行进的。于是学会带着乌龟漫步于村子围墙内,并体验着如何在围墙外跨步赶上社会的脉动。

经历战乱的外省第一代给他们留下的是率直、冲动、重感情、好逞强的江湖意气,也是他们后来远走欧美留学或从商的魄力。阿宝的小说《卡门在台湾》、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对眷村中生长的第二代外省人的生活进行了入木三分的

刻划。马革裹尸气豪壮的战争想象对他们而言是憧憬也是梦魇,并不时反映在生活之中。从小时候的分成两派玩武侠拼杀,两派头目各自拼命拉人充实力量的游戏,到长大后聚勇斗狠,抢夺地盘的帮派行为都是眷村中所营造出的特殊氛围。

正如小说《卡门在台湾》中的眷村外省人阿宝所言:“外省人第二代在台湾能搞出什么名堂?没有钱又没有地。想要出头,不是要向老头子的威权靠拢,就是向土财主的金权投降。”^[14]这样的描述可以说贴切地道出了外省第二代对于台湾本土意识所怀有的特殊又复杂的疏离心态。

六、逝去的一代:台湾社会的变迁与进入废墟的眷村

眷村象征着一个时代充满挫折的悲剧。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本土化的冲击,台湾当局试图藉由眷村改造与文化遗忘来转化外省族群的浓厚灰色氛围。这使得眷村两代外省居民对于过往,无法有一个完整记忆,只能藉由属于自我“物”的片断去做拼贴回忆。

眷村外省第一代被战争逼迫离开家乡,并且因时代政治与法令的限制失去所有亲人的联系。“家”的一切变成只存在于心中某个角落的片断回忆,父母的形象只剩下仓皇败退中压在行李箱底的两张泛黄相片。为了反攻计划,他们关起门来生活在眷村之中,也因为如此,对于台湾老百姓的认识也是片断的。回想起年轻在台湾的生活,除了兵工厂、军队,就是村子。这些人也因时代的氛围及标签化的结果成了台儿庄大捷、一江山岛战役,甚或被加之于身的“二二八事件”原罪的回忆之“物”,即便绝大多数的置身事外的眷村外省人也留下了这些历史事件的烙印。

对于眷村第二代而言,从小就注定要活在一个碎裂的命运和记忆之中。台湾作家张启疆曾在《君自他乡来》中提及:“你们的身世之谜另有一说:你们的父亲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15]

这个说法,把眷村两代间对于回忆及身世做了一个残酷的描述,也说明属于眷村外省人的一切,被战乱硬生生切成片断的事实。第一代对于家乡的回忆及村外世界、第二代对于眷村长辈们口中的国与家以及接触到的台湾社会,都成了一个拼凑画面。所谓的“眷村”或“家乡”在时间流逝下对这群飘荡于竹篱笆内外的人已经渐渐远去,虽然他们都会在无

意中强烈的回想起那些零碎的回忆。

眷村的兴起,在当时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土地成了最珍贵的资源,许多眷村开始改建,情况好的兴建居民区,每一户都能分到一所房子,从原本低矮的小平房住进高层公寓里,居住面积也较过去宽敞。“国宅”盖起来了,曾经在白蚁啃食木头声陪伴下苦读的眷村第二代及老弱残兵的外省“老芋仔”都有了共同的“新家”。

但是并非所有眷村住户都能得到妥善安排,也有部分眷村当年兴建的土地属于公有地,依照城市规划可能是公园用地,为了市政建设,台湾当局决定收回这些土地,像是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便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本住在公园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便没了居所,家中收入好的还可以另购新居,但是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就陷入困境了。如今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树木逐渐茁壮茂盛,公园成为邻近居民休闲的去处,年少的孩子们已经不记得原来这里是一处村子,但是那些初抵异乡,曾经在此安身立命的人,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30年岁月,如今他们已垂垂老矣,时代的变迁带给他们的恐怕是唏嘘多于欢乐。

时至今日,眷村作为两岸纷争历史的产物,逐渐走向消亡。国民党到台湾后最繁盛时多达900个的军事村庄,今天只剩下约140个,而且还会越来越少。但是眷村文化作为台湾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次文化形态,记录了台湾外省人的过去,眷村文化所留下的省籍矛盾还影响着台湾的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 [1] 杨渡.第4波移民压迫第7波移民[J].台湾新新闻,2007,(1058):2007-06-14-06-20(22).
- [2] 民进党.“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2007年8月30日第十二届第十三次中执会决议通过)[DB/OL].民进党中央党部网站.<http://www.dpp.org.tw/>.
- [3]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A].苏伟贞.台湾眷村小说选[C].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43-45,55.
- [4] 孙玮芒.卡门在台湾[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218.
- [7] 张启疆.君自他乡来[A].苏伟贞.台湾眷村小说选[C].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142.

责任编辑:肖红